

## 序

王小盾

在通常所说的“二十五史”当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一批音乐史料。这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所载的 17 种乐志和 8 种律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故学者丘琼荪先生曾对这批资料加以整理，进行了《史记》至《魏书》等七史乐律志的校释工作；但《隋书》以后十史乐律志的整理与研究，则因工程浩大、问题复杂，而未能完成。这项任务——编纂一部完整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的任务，于是历史地落在后一代学人的身上。

学术界为什么会重视《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的编纂呢？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需要——因为史书乐律志提供了一套反映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文本。这套文本代代连续，系统展示了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主流线索。诚如丘先生在《校释》一书的《序》中所说：“有意于了解历代音乐概况者，有志于研究我国音乐史、乐律史、乐制、乐器、乐调、民族

音乐、域外音乐，乃至歌曲、舞蹈、戏剧、散乐、曲艺等等之兴亡隆替及其衍变流转情形者，请先于历代《乐志》、《律志》中求之。本书之作，乃欲为之梯航。就是说，这是一批内容丰富而自成系统的音乐史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考察中国传统音乐，都能从中找到基本的历史线索。对它进行校释，因此是建构一部完整的中国音乐史的“梯航”。丘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而近年来的学术发展，又从另一个角度把这项工作提上日程了。这就是对中国现代学科进行整体建设的角度。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一百年来的学术发展。大家知道，这是中国科学各部门实现体系化的一百年。随着现代教育的出现，包括中国音乐史在内的许多学科，相继登上了大学的讲堂。换言之，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音乐学，从它产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新学科是循着三条途径发展起来的：其一是引进新的科学方法，改造旧学科而成为新学科。例如在引入地层学、器物类型学、年代学等方法以后，旧的金石学转变成成为科学的考古学。其二是发掘新的材料，以此作为建立新学科的基础。例如在殷墟甲骨、敦煌写卷、流沙坠简、四夷碑铭、内库档案等新发现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殷商史、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学科。其三是通过学科交叉而产生新学科，例如以民族学的资料与方法研究音乐而造就民族音乐学，以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研究文学而造就文学人类学。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也经由了这些途径。一旦方法发生变化——那些对现象事物加以描述和概括的数学手段被引入音乐研究，乐学、律学和乐谱之学便从根本上获得了改观：一旦资料质量发生变化——田野资料和文物资料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国音乐学便在“中国音乐史”之外，建立了“传统音乐研究”、“音乐考古学”等新的分支；一旦学科结构发生变化——包括历史学、文献学、科技史、语言学、社会学在内的诸种学科方法同音乐研究结合起来，中国音乐学也就

成了一个成熟的学科。

尽管在目前，中国音乐学规模不算大，人数不算多，但以上情况意味着，在中国现代学科整体建设的全局之中，它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若是作一些学科比较，我们还会明白，它甚至是具有相当先进性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比较是：较之于其它历史学科，中国音乐学拥有特别悠久的历史 and 非常丰富的资料。比如，中国音乐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当中原国家把礼、乐相结合，在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仪典之时，中国的音乐理论已经开始形成强调等级之分、强调音乐沟通天人之作用的特色，产生了最初的音乐社会学和音乐美学。从此之后，伴随着礼制文献的建立，关于中国音乐的记录就是不绝于书的。历代史书为“音乐”或“礼乐”设《志》，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另一个比较是，从研究工作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音乐学拥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国史学的一些新的方法论趋向，早在中国音乐学中已经实现：一方面，中国音乐学早已注意了文献、文物、民间遗存这三部分研究资料的结合；另一方面，它一直重视对长时段现象、重复性现象进行探索。黄翔鹏先生所提出的“传统是一条河流”的理论，正是对这种研究实践的概括。这一理论还表明，在其它历史学科看来那些难以企及的理想，例如在逻辑平面上再现历史结构这一理想，在中国音乐学中却正在变成现实。

上述情况，也许不需要所有的研究者去关注。但正像在每个学科中都会产生通儒、专家两种人一样，音乐学界也必定有人懂得：新世纪的中国音乐学，承担了特别重大的责任，需要满足特别高的学术要求；工作于其中的研究者，应当有全局的关怀，以开放的姿态来建设学科。杨荫浏、黄翔鹏就是这种具有全局关怀的人物。所以黄翔鹏曾经就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建设提出了“以资料工作为中心，开门办所”的方针，并

在《对中国乐律学史学科建设问题的一个初步构想》（载《音乐学术信息》198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整理音乐古籍、汇集音乐史料的具体设想。这一举措使我们想到古代庄子的一个比喻：行百里之路，要用一宿的时间准备粮食；行千里之路，则应当“三月聚粮”。强调资料工作和学科开放——或者具体地说，把发展音乐文献学作为资料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等音乐古籍的整理工作来建树中国音乐文献学的支撑点——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三月聚粮”。

“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与研究”这一项目，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提出来的。从1998年开始着手实施，到现在，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六年时间。在这六年当中，我们越来越明确地建立起了“三月聚粮”的意识，也反复遭遇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工作和丘琼荪先生《校释》一书有什么异同？这两件事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如下回答：

从文献学角度看，我们的工作 是丘氏《校释》的继续。——它的基本内容仍然是依据各种版本、各种历史文献来校勘诸史乐志，并利用全部已有成果来笺释其中的名物制度。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却是一种新的工作。其一，它在规模上改变了。它是一系列音乐文献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同时进行的有《古乐书钩沈》、《乐府诗集笺校》、《中国音乐史长编》、《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韩国汉籍中的表演艺术史料》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有比较广阔的意义：对于中国音乐史学而言，它是一个充分的基础工作，有助于全面揭露各种历史事物的本质；对于考古学资料和民间遗存资料而言，它是具有年代学意义的工作，其成果可以作为其它资料的标准器；对于一个完整的中国音乐学学科而言，它是自成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其中必要的学科分支。其二，它在性质上也改变了。它不是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把音乐史料的整理工作和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要面向文献时

的理论建设，面向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视野。现有成果表明，它将在史源学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古代乐书的聚散分合；它将从考察古代音乐资料的记录方式入手，分析音乐制度的承转通变；它将全面清理关于中国雅乐和乐律学的历史资料，重新认识作为一种文化和文明（而不止是一种艺术）的音乐；它将把过去在平面意义上理解的“音乐”竖立起来作分层次的研究，例如区分为仪式音乐和艺术音乐来研究，区分为宫廷音乐、士大夫音乐和庶民音乐来研究，并且研究其间的关系和关联。因此，它的成果将不仅有助于指导音乐文献工作的实践，而且可以丰富已有的古典文献学理论。举一个例子：对稍纵即逝的时间艺术加以传承和记录，其传承方式、记录方式的特殊性及其文本表现，就是新的文献学将要讨论的内容。

这样一些工作，显而易见，是光荣而艰难的。作为首批进入《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工作的学人，李方元、王福利、孙晓晖、温显贵四位，因此进行了名副其实的学术攀登。现在，他们已经征服了冲顶前的另一个高地。他们在系统校勘《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所载乐志、律志的基础上，在对这些古代音乐典籍进行初步笺注的基础上，完成了《两唐书乐志研究》、《宋史乐志研究》、《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清史稿乐志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而且，经过审查，这些论文又分别被中华书局、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他们的成果于是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嘉惠学林了。这是一件值得祝贺、值得回味的事情。

回想起来，几位同学是按不同的方式走到一起来的。如果说王福利的方式是脱胎换骨，孙晓晖的方式是逐步皈依一种新的学术风格，那么，李方元的方式便是自觉进入新学科。李方元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当他离开音乐学院院长的职务重新坐进课

堂，当他在若干深造方向中选择了音乐文献学这一方向之时，他已经作好了虚心学习、重新起步的思想准备。他按照教学计划，进修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学术史和古典文献学等课程；他接受古典目录学训练，参加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一书的文献分类工作；他在系统研究校勘传注之学的基础上，对《宋史乐志》17卷、《宋史律志》乐律学内容1卷进行了校勘；此外，他还进行了一系列文史考据的练习。他听课很专注，作业很投入，进步也很显著。1998年年底——进校一个学期之时，他就在熟读孙诒让《周礼正义》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关于先秦裸礼（灌礼）的考证文章。此文规范地运用古文字学、历史学的资料与方法，对商周两代裸礼的来源及其文化内涵作了富于新意的解释。

裸礼研究这件事情曾经让我欢喜了一段时间，因为它从考据学角度表明了李方元对学术传统的领会。但一年以后，李方元又以另一件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他对学术传统的领会。这就是文献学角度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治学思路，叫作“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意思是通过目录学来求取作为研究对象的典籍，又通过对典籍的探究来达到对真理的探究。其基本精神是讲究从资料出发 讲究典籍的整体性。这一思路是同古人把读书与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习惯相联系的，来自于把文献学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长期实践。今人的治学习惯与此颇不相同。今人往往从问题出发，根据现有的理论来划分事物单元。其实质是重视概念和原则；为了迁就概念和原则，他们不惜割舍掉典籍的历史形式。即使在古典文献学领域，这种习惯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对古代典籍进行研究，尽管都是“因书究学”的工作，但其中仍然包含三条不尽相同的研究路线：一是从原始资料出发，二是从既有问题出发，三是综合这两者。这三条思路未必可以分优劣；但在实践中，考察资料和研究问题，毕竟构成

了基础研究与后续研究的关系。李方元的博士学位论文，所采取的路线恰好与今人习惯相反。它选择文本形式研究的角度，以典籍比较的方法来考察正史乐志的编纂传统和《宋史乐志》的文献学背景与渊源，是一项严格的音乐文献学的基础理论工作。从学习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2001年11月16日，论文答辩前夕，我曾就李方元的学位论文提出了以下评审意见：

李方元同学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和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分别在这两所学校取得学士、硕士学位，有很好的音乐学基础。进入我校以后，他自觉地加强了文献学、学术史等新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和训练，成功地实现了由音乐学到音乐文献学的学术转变。三年来，他以刻苦钻研、好学深思的态度，认真完成了每一项学习任务，特别是完成了《宋史·乐志》校释的阶段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博士论文《〈宋史乐志〉研究》的写作。这篇论文创造性地选择了音乐文献学的角度，重点考察了历代乐志的传统和《宋史·乐志》的文献学渊源，达到了预期目标。其主要贡献是：

一、通过对《史记》以来历代乐志的考察，论述了古代乐志传统的形成及其特点；

二、通过对《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文献通考》等文献中宋代礼乐资料的梳理，较全面地考察了《宋史·乐志》的资料背景；

三、通过对《宋史·乐志》与上述诸书音乐资料的比较，较周密地探讨了《宋史·乐志》的史料来源；

四、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宋史·乐志》的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总之，这是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意提交答辩。

这篇评语所谓“创造性的选择”，主要指的是作者本人的自我塑造。因为文献学角度的研究古已有之，但对于一个演奏出身的音乐研究者来说，它毕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维和方法。

当然，这种研究还意味着一个宽厚的平台、一个光明的前景：在对《宋史乐志》作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宋史乐志》之内容的探讨、对宋代礼乐制度的探讨——这些后续工作势必大刀阔斧地展开。这正是我们可以深望于李方元的。

王小盾

2004 年春节

## 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本文以《宋史·乐志》为研究对象。其具体研究思路是：通过资料和版本分析，来讨论文本的编纂过程；通过学术史的考察，来总结乐志写作的历史传统；通过对宋元前后各种音乐史籍的比较研究，来探讨《宋史·乐志》史料来源；通过对《宋史·乐志》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来讨论其历史性质。总之，本文是以书籍为单位，以学术史为背景，以历史资料为对象的比较分析研究。

本文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简述宫廷音乐实践与乐志写作的关系，指出实践是本原，乐志是对当时音乐实践的记述，同时指出乐志由资料、观念、版本三要素构成。二是阐述了《宋史》的修纂经过和版本状况，指出元修《宋史》具有充足的宋代史料，元刻本是后世版本的祖本，《宋史》只有一个单一的版本系统。

第二章讨论乐志历史传统的形成及其特点。本章以南宋前十部乐志为对象，首先对历代乐志的内容和文本形式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乐志写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乐义、乐史、乐类

和乐章四项；其次，在此基础上指出乐志修纂的主旨是：正乐、辨统、知典和晓理；最后通过历史的考察，揭示了乐志写作传统形成的三个时期：西汉《史记·乐书》为创立期，东汉《汉书·礼乐志》为定型期和梁《宋书·乐志》为多样化期之开端，并得出了《汉书·礼乐志》与《宋书·乐志》是传统乐志文本写作的两个基础的结论，和传统乐志文本体制的四种主要类型：以乐义、乐史、乐类和乐章为代表的四部体制，如《旧唐书·音乐志》；以乐类、乐史、乐章或乐义、乐史、乐类为代表的三部体制，如《宋书·乐志》、《新唐书·礼乐志》；以乐义、乐史或乐史、乐类为代表的二部体制，如《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和以乐章或乐史为代表的一部体制，如《南齐书·乐志》的结论。

第三、第四两章讨论的是《宋史·乐志》的资料背景及其史料来源。第三章的讨论涉及两个方面：一、利用目录书对宋代音乐书籍的存佚情况进行考察与分析，指出了宋元时音乐书籍的基本状况；二是对四部宋代主要典籍（《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和《文献通考》）的历史状况和礼乐资料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得出宋代礼乐资料有实录（包括国史《帝纪》）会要、国史乐志三个不同的文本系统、《文献通考》中宋代音乐资料部分出自宋国史《乐志》等结论。第四章把上述四部书中的音乐资料分别与《宋史·乐志》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得出《宋史·乐志》与前三部书没有共同的史料来源，《宋史·乐志》与《文献通考》史料基本相同，其史料亦出自宋国史《乐志》等结论。

第五章重点讨论了《宋史·乐志》的文本特点及其资料状况。首先进行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分析和归纳，概括出十项主要内容，并作出扼要的评析，同时就编撰形式进行讨论，指出《宋史·乐志》与传统乐志体制的联系及其自身特点；其次通过深入探讨，揭示了《宋史·乐志》写作在注重音律和

雅乐实践等方面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雅乐的音乐性问题在宋代被重新认识，雅乐的音乐本质得到重新展现。

第六章分两个方面讨论《宋史·乐志》的历史性质。首先考察的是《宋史·乐志》资料的历史性质，即：一、通过相关礼乐资料的历史境遇，考察宋代礼乐资料的基本状况；二、通过宋代礼乐资料的文本系统，探讨《宋史·乐志》资料的历史性质及其地位；三、通过与乐志传统的历时比较，考察《宋史·乐志》雅乐资料的性质。最后指出《宋史·乐志》是一部具有独立文本系统、资料完整和专史性质的史籍，本质上是一部宋代的礼乐文献，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玉海》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史料价值不可取代。其次讨论了《宋史·乐志》的雅乐史观和音乐观，并归纳出：重西周前的音乐传统，重礼乐不相沿袭，坚守雅、郑观念，弱化乐系时政的社会功能、推崇实践的雅乐观等六种主要观念，由此揭示出宋代主流音乐观念的历史变化。

第七章是结论与余论。结论总结全文，对各章讨论进行归纳并对各个小结进行总说，指出了《宋史·乐志》的宋代资料性质及其主要特点。余论中针对乐志的音乐写作，对乐志写作的史特点、音乐书写的性质、乐志写作的传统特色和宫廷雅乐的双重性质进行了进一步的申论。

## Abstract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is chosen as the thesis' main focus of attention. The author's concrete train of thought is that sorting out the data and edition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exts; Investigating academic history, the author's aims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he *yuezhi* (乐志) writing; According t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related ceremony musical material, the author trace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origination of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In the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the study is attempted to discuss its nature in history.

The thesis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even parts.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wo questions with two main points: Firs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the solemn courtly music and writing for *yuezhi*, both of which are different and interrelated. Secondly, while examining the course of the compilation and editorial circumstanc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a Yuan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is the primordial origination of later ages, and the Song History has only one editorial system.

The second chapter deals with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about *yuezhi*. It is intended for 10 *yuezhi*, which were prior to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alyzing and concluding content and form of *yuezhi* through the ag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gist of the compilation of *yuezhi* on the basic of main contents, and finally the author presented his analysis of four kinds of patterns of text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writing tradition for *yuezhi*, and three decades: founding, finalizing and manifold. *The Han history Records and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made a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yuezhi* writing.

Primary emphasis in the third and the forth chapters is on data background and origin of historical data. The third discussion deals with two respects which the author summed up as follows: (1) Taking an observation of musical work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by making use of bibliographical books. (2) Giving detailed arguments of four main ancient codes and record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such as *songhuiyao jigao* (宋会要辑稿), *xuzizhitongjian changbian* (续资治通鉴长编), *yuhai* (玉海) and *wenxian*

*tongkao* (文献通考), and the author has shown us in his conclusions that ceremonies and music data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belong to three distinct textual system which including the Veritable Record, *huiyao* (会要) and *guoshi* (国史). *Wenxian tongkao* musical data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stemmed from *yuezhi* of state records. I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author contrasts the above-mentioned musical data with *the Song Dynasty Records of music*, and holds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also stemmed from *yuezhi* which is written during the contemporary Song.

The discussion in the fifth chapter centers on the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and its data condition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which has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its own, but concer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ystem, and probes deeply into the cardinal change in writing of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that is laying stress on the practice of elegant music, which shows that essence of elegant music should be reconsider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sixth chapt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hich deals with the historical quality of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The thesis shows that in contrast with *songheiyaojika*, *xuzizhitongjiohangbian* and *yuhai*,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has a place of equal importance in history. Its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cannot be replaced. Its sense of elegant music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ink highly of musical tradition which was prior to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persist in the views of elegant music—reduce the social functions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have the greatest esteem for views of elegant music that is put into practice.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summed up each parts as follows: *The Song History Records of Music* is of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three main traits: (1) A style of traditional *yuezhi* writing; (2) The Song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in the Yuan Dynasty;(3) Musical data with basic essence of elegant music offered.



## 第一章

### 绪 论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宋史·乐志》。乐志，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种体裁，一种音乐文本写作样式，一种音乐的知识体系。作为正史体裁之一种，乐志在史学写作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本体制，自己的写作对象和写作传统。作为国家认可的音乐文本，乐志是宫廷音乐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书写。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亦涉及到一个时代主流音乐的价值取向、社会功能和音乐类型等知识领域。事实上自秦汉以后，乐志一直是一个时代音乐知识体系主要的体现形式，主导了音乐书写文化的历史潮流。可以说，乐志即是一个时代音乐历史发展的缩影，一部书面的音乐历史。

任何一部乐志提供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与修纂工作、文本样式、史料来源和社会音乐观念等紧密相联系的；纂写本身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本资料的历史真实。因此，有关乐志的修纂、文本、史源和音乐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亦属乐志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笔者就此认为，有关历史的研究，可以分成两个领域：以文本为中心——即文献学的领域；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即历史学的领域。本文属于前者。如果从文本的文献性质着眼，“乐